

沉潜与喧嚣

——当代诗歌论

伍明春◎著



沉潜与喧嚣

——当代诗歌论

伍明春◎著

本书得到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专项资金资助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沉潜与喧嚣：当代诗歌论/伍明春著.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 12
ISBN 978-7-211-07030-5

I. ①沉… II. 伍… III. ①诗歌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3905 号

沉潜与喧嚣——当代诗歌论

CHENQIAN YU XUANXIAO——DANGDAI SHIGE LUN

作 者：伍明春

责任编辑：林 顶

特约编辑：林 荫

出版发行：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0591-87533169(发行部)

网 址：<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fjpph7211@126.com

地 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350001

经 销：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福州市仓山区金山大道 618 号橘园洲工业园 19 号楼

邮政编码：350002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24.5

字 数：327 千字

版 次：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11-07030-5

定 价：4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辑 “归来诗群”论

回归久违的诗坛	(3)
再度拥抱诗神的艾青	(8)
恢复诗艺的多条路径	(13)
走向分流的道路	(19)
牛汉写作的“衰年变法”	(26)
郑敏：从寻觅到创造	(32)
汉语诗歌的本体之思	(39)

第二辑 现象与个案

抒情姿态的变化

——现代汉诗与民生关系的一种考察	(47)
------------------------	------

文化记忆、抒情策略和文类自觉

——略论地震题材诗歌	(58)
------------------	------

“中间代”：作为一个关键词	(67)
---------------------	------

现代汉诗的本位寻求

——论王光明著《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	(73)
--------------------------	------

先锋的守夜人

——论余怒的诗	(85)
---------------	------

新诗写作疆域的开拓	
——论臧棣的系列诗	(94)
在形与质之间寻求平衡	
——论屠岸的十四行诗	(104)
重构女性与世界的关系	
——翟永明《女人》组诗简论	(112)
从回望记忆到直面当下	
——论缪克构的诗	(118)

第三辑 闽地诗歌观察

执著坚守与寻求突破	
——论新世纪以来的福建诗歌	(129)
在沉潜坚守中稳步前行	
——2010—2011年福建诗歌漫评	(146)
福建当代诗歌概观	(155)
想象城市的几种方式	
——以当下福州诗歌写作为例	(160)
明朗的冥想与倾听	
——论余禺的诗	(165)
“水”：多维想象和诗学隐喻	
——哈雷诗歌新作管窥	(177)
撒娇，然后逃离	
——评谢宜兴的《北京日记》系列诗	(186)
先锋的再出发	
——论巴客的诗	(190)
叙述“更高的虚构”	
——读陈苇近年的诗	(204)
从月亮的背面出走	

——评西楼的诗	(210)
聚合碎片的光芒	
——涂映雪诗歌的爱情想象	(218)
语言之轻与存在之重	
——读柯友珊的诗	(223)
足行大地，心在云端	
——评三米深的诗	(227)
在语言中还乡	
——评周园园的诗	(233)

第四辑 散文诗评论

论汉语散文诗的文类边界	(239)
福建百年散文诗概论	(258)
多向生长的力量	
——评“福建散文诗小辑”	(275)
文字与图像相生共舞	
——评陆永建的《飞翔的痕迹》	(279)

第五辑 诗歌现场扫描

“吃文化”的另类演绎	
——评吕约《吃》	(285)
“自言自语”的力量	
——评哑石《短句》	(288)
斑驳秋色和凛冽诗思	
——评沈浩波《秋风十八章》	(291)
穿透日常的空洞	
——评张执浩《诗四首》	(294)

从小贝壳到女骑士	
——评叶玉琳《海边书》	(297)
地域想象的多种可能	
——评潘维《柴达木盆地》	(300)
繁华背后的都市冷暖	
——评王小龙《街头回旋曲》	(303)
飞翔的悖论	
——评欧阳江河《凤凰》	(306)
解开时光编织的死结	
——评北岛《黑色地图》	(309)
口语写作：难度及其超越	
——评汤养宗《一生中的一秒钟》	(312)
青春话语的艰难突围	
——评林宗龙《所爱》	(314)
身体叙事和疾病隐喻	
——评路也《心脏内科》	(317)
诗人角色的当下境遇	
——评陈先发《养鹤问题》	(320)
时代印迹的锐利呈现	
——评顾北《作为王的男人》	(323)
挖掘卑微的诗意	
——评谢宜兴《即使活得卑微》	(326)
无所不在的断裂感	
——评何若渔《远方》	(329)
以女巫的目光打量世界	
——评巫小茶《女巫观察者》	(332)
语言生殖力和思想魔幻术	
——评臧棣《假如还有机会去伊斯坦布尔的话丛书》	(335)
在异乡的生命之思	

——评安琪《给外婆》	(338)
重建人和自然的关联	
——评盘妙彬《青山就是中年，春风就是老虎》	(341)
自我的出走与回归	
——评庞培《雨中曲》	(344)
自我的蜕变和新生	
——评俞昌雄《春风有知己》	(347)

附 录

诗与生命交相辉映	
——蔡其矫访谈录	(353)
“我坚定地相信诗本身的独立存在”	
——孙绍振访谈录	(368)

第一辑 “归来诗群”论

回归久违的诗坛

1970年代末和整个1980年代，中国诗坛的主要力量有两支，一支是以北岛、舒婷等为代表的朦胧诗人群，另一支是以郑敏、牛汉等为代表的“归来诗人群”。他们所构成的合力，共同推动着当代汉语诗歌艺术的发展。

与其说“归来诗人群”这一名词是对一个诗人群体的概括，毋宁说它描述了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独特而重要的现象。事实上，对于“归来诗人”这个概念所指称的对象，无法以某种风格流派简单地进行整合。它包括“七月诗派”诗人群（如艾青、牛汉、彭燕郊、曾卓、绿原、鲁藜等）、“九叶诗人”群（如穆旦、辛笛、郑敏、杜运燮、唐湜、陈敬容、唐祈等），以及20世纪50年代初崭露头角的诗人（如公刘、邵燕祥、白桦、流沙河、赵恺、林希、梁南等）。他们先后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和随后的“文化大革命”等各次政治运动中“消失”（被剥夺创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甚至生存的权利），正如谢冕在一篇文章中所形容的：

可惜的是，我们的诗歌队伍在人民取得了全国政权之后，却日益缩小。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总有一些诗人的名字消失。我们的队伍，得了人为的败血病。到了“文化大革命”这支队伍已荡然无存。^①

^① 谢冕：《新诗的进步》，《新诗的现状与展望》，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二三十年的沉默，使这些诗人们付出了十分惨重的代价，创作的黄金时光被荒废、艺术个性被抹杀、已经启程的诗歌探索之舟被搁浅。他们不幸地被放逐于诗歌艺术之外，成为精神上的被压迫者和流浪者。政治，如同一只无形却极有力的手轻而易举把他们从诗坛的各个位置中剔除出去，抛到各种“被改造”的险恶处境之中。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随着社会气候的转晴，这些诗人才陆续在各种公开刊物上重新露面，以一种略显嘶哑的声音重温久违的歌唱。尽管起初他们的歌唱难免带有练嗓、试声的特点，但毕竟使一度断裂的抒情言路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使他们的艺术个性又有了发挥的可能。

纵观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行程，不难发现其与政治之间那种纠缠不清的暧昧关系：“20 世纪文学的发展，确实时时受制于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与氛围，这不仅体现在许多文学作品所表露出的在题材上的政治化特征，在题旨上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而且全面体现在整体的文学目的和文学观念上。政治化思想影响着 20 世纪大多数年代文学的基本走向。”^①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既与 20 世纪中国社会的内乱外患分不开，恐怕也与中国文人文化心理中“文以载道”这种传统因素的积淀有关。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结缘发展到极致，即文学成为完全从属于政治的“奴婢”，沦为政治斗争中的工具和武器，毫无自觉与自为可言。而诗歌，作为一个天生与政治有着亲和力（形式简短有力，适于传达激情、标语口号的“堂兄弟”等特点就是其具体表现）的文类，其与政治的关系更是得到强化。当政治出于形势的需要，要求诗歌发出异口同调的声音时，许多有自己的艺术追求的诗人由于无法“合作”和难以忍受而黯然放下手中的笔。因此，说“归来诗人群”中大多数人都曾是病态的文学高度政治化的牺牲品，也许并不夸张。虽然这些诗人在 50 年代初期（1957 年以前）还享有较大的创作自由，但这一时

^① 朱晓进：《文学与政治：从非整合到整合》，《社会科学辑刊》1999 年第 5 期。

期所创作的诗歌，大多数都是对举国上下为新政权建立而发出的狂欢高呼的一种回应，从而显得较为空泛和滥情，艺术价值也就得大打折扣。在“七月诗人”和公刘、邵燕祥等血气方刚的青年诗人那里尤其如此。牛汉在90年代一次接受诗刊记者采访时，曾经表示自己过去的诗歌创作“偏离了诗的教训太多”^①，这个说法对其他诗人也基本适合。到1958年，与工农业生产实行“大跃进”的形势相配合，文学创作上也在提倡“多、快、好、省”。夏衍号召剧作家要“又快、又好地写出上演省钱的大量剧本”^②。巴金、田汉等作家都定出了很不合理的创作指标^③。而在诗歌创作方面，出现了“大跃进民歌运动”，似乎在一夜之间，全国人民都摇身一变而成了诗人。滥用夸张手法是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在那种情势之下，甚至像卞之琳这样一位学贯中西的优秀诗人，也写出了关于北京郊外十三陵水库的开掘的应景之作《动土答问》^④。而在当时的青年诗人梁上泉、阮章竞等人看来，诗歌中的“大跃进”简直就是“浪漫主义乐观精神的一种扩展”^⑤。他们的想象总是从公社的某些景象出发，纵横万里，天上人间，带有浓重的浮夸的色彩。而到了1966年之后，“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的文学更是受到空前的灾难性打击，诗歌当然也概莫能外。诗人们除极少数人坚持“地下写作”外，大多数人的声音都被汹涌的斗争洪流淹没了。

“归来诗人群”的消失是由于种种政治原因而被迫作出的无奈选择。而他们的“归来”同样具有某种被动的意味。他们之所以能够

① 晓渡：《历史结出的果子——牛汉访谈录》，《诗刊》1996年第10期。

② 夏衍：《多、快、好、省，量中求质》，《文艺报》1958年第6期。

③ 巴金提出在一年内，承担写一部长篇小说，三个中篇，再加上搞些翻译；田汉宣布他将写10个舞台剧本和10个电影剧本。可他们这些计划都告失败。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72页。

④ 卞之琳：《动土答问》《诗刊》1958年第3期。

⑤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876页。

重新“浮出水面”，是与某种较为宽松的政策密切相关的。如改变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命运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当然也对这些诗人有效。换句话说，如果政府不提供类似上述的政策，那么这些诗人就可能永远消失。这不免让人对他们作为艺术创作主体的人格独立能力的相对低下感到悲哀。在今天，也许我们会轻易地指责他们当年的艺术立场太不坚定，甚至放弃了各自的艺术追求。然而，当我们细心翻阅当时的有关史料，发现政治与文学是如此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以致本身就处于弱势的文学几近窒息之后，就不难理解这些诗人离弃诗歌的某种“合理性”。事实上，如果他们在那样的年代仍在写作和发表作品，那也只能制造一些浪费艺术才华、损伤诗歌质地的虚假之作。长久以来，中国的文人与政治之间结成了一种恩怨纠缠、难解难分的关系。这就造成了文人内心的矛盾冲突和两难处境：一方面要看政治的脸色行事，一方面又不想违背艺术良知。当然，冲突的结果往往向强势的前者倾斜。就连“消失”前和“归来”后都享有很高地位的诗人艾青，对此也有一种不自觉的意识：

如今，时代的洪流把我卷带到一个新的充满阳光的港口，
在汽笛的长鸣声中，我的生命开始了新的航程。^①

这段曾被广泛引用来形容艾青开始第二次创作青春的文字，从字面上看来颇具明朗的底色（“阳光”、“新的航程”）。事实上它也隐隐地道出了政治对文学（包括作家，作品）的裹挟，从“卷带”一词就可以看出个人在变幻不定的时代风云面前所表现出的无力与脆弱。而在另一篇文章里，艾青更是直接说出了他的抱怨：“许多比我年轻的死在我前面了，我却还活着。要是在七、八年前死了，和死了一条狗没有什么两样。”^② 这是“归来”者的一种令人十分心寒的

① 艾青：《在汽笛的长鸣声中》，《艾青谈诗》，花城出版社1982年。

② 艾青：《我的创作生涯》，《诗刊》1983年第8期。

自我庆幸。

无论如何，这些诗人作为幸存者毕竟已从被称为“文学界的重灾区”的诗坛重新获得了创作自由。虽然 70 年代后期（1976—1978）的社会政治气候仍呈现出乍暖还寒、欲晴尚阴的态势，但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正渐渐透露出一线曙光。诗人们被压抑了一二十年的声音终于找到爆发的机会。他们不仅在一些重要的文学刊物（如《人民文学》、《诗刊》等）上发表作品，也以较快的速度出版个人诗集和《九叶集》、《白色花》那样的多人合集。在诗歌创作上，他们干劲十足，似乎要在短短几年就把失落的过去补偿回来。不惟诗人们自己充满信心，评论界也为他们的“复活”，或曰“出土”大声鼓呼。诗评家谢冕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在《新诗的进步》、《重获春天的诗歌》、《时代召唤着新的声音》等一系列文章中，他以一种十分诗化的语言为重获生机的诗歌欢呼，也为归来的诗人们呐喊助威：“我认为新诗在进步，新诗在重新获得春天。我甚至认为，中国新诗三十年来的形势，从来也没有像最近三、四年，特别是一九七九年这么好过。……我们的眼前突然涌现了一批对于三十岁左右的青年说来是完全陌生的名字。被‘政治’放逐的诗人回来了，被各种各样的‘政策’所贬斥的诗人也回来了……”^① 尽管这些声音多少还夹杂着闪躲和惶恐的因素，但对于心有余悸的诗人们来说，无疑是一种极有力的支持。其他论者如杨匡汉、骆寒超、晓雪等也纷纷作文著书，为刚刚恢复元气的诗坛营造了一个较为良好的舆论环境。

^① 谢冕：《新诗的进步》，《新诗的现况与展望》，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编，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再度拥抱诗神的艾青

在“归来诗人群”中，“九叶诗人”的复出相对其他诗人而言，显得较为低调。这恐怕与他们的诗歌艺术主张密切相关。毕竟他们所熟悉的现代诗歌技巧和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社会对文学的期待显得格格不入。当时的典型语境是一种普遍性的情感申诉和历史“反思”。政治抒情诗无疑是这一时期的最佳诗歌体式。政治抒情诗常常较为直接地抒发情感，并及时地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紧密相连，因此能够相对容易地为社会大众所接受。

正是出于上述原因，艾青、绿原等“七月”派诗人和公刘、邵燕祥等5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诗人重新回到诗坛就显得比较热闹。尤其是艾青，在1978年4月发表标志他重返诗坛的诗《红旗》之后，评论界几乎毫无例外地对他的复出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极高的期冀。除内地各级报刊可谓铺天盖地的评介文章（甚至连《广告》这样的非文学杂志都刊了一篇艾青的访问记）外，香港评论家司马长风、陶然和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等人也在海外纷纷发表文章遥相呼应^①。面对百废待兴的诗坛，诗评界把艾青当作诗歌新希望的化身是再自然不过了。虽然1978年的艾青已是一个年近70的老人，但是凭着他在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和身份，人们有理由在他身上寄托殷切的希望。关心诗歌的人们企盼着这位“老诗人”在诗歌创作上

^① 据《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艾青专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一书中“评介文章目录索引”：司马长风《诗人里的诗人》（载1978年12月20日《澳门时报》），陶然：《速记艾青和诗人们》（载1979年3月6日香港《新晚报》），聂华苓《漪澜堂畔晤艾青》（载香港《七十年代》1978年第9期）等。

再度焕发出青春活力，他们认为艾青“老当益壮，老而弥高，一句话，他思想上、艺术上更加成熟了，而其精神却更加年轻了。……‘所向无空阔’，到了晚年还能保持着精神上这种锐气，……”^① 其中当然不乏真诚，因为他们对艾青的期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新诗复兴的企盼。值得一提的是，下面几句被论者广为引用同时也曾出现在艾青本人文章中的“读者来信”，也传达了同样的信息：“我们找你找了二十年，我们等你等了二十年。”^② 尽管这里包含几分矫情，但确实也流露出人们对于长久以来诗坛处于“假、大、空”状态的不满和对“真诗”的呼唤。因此，当艾青的《在浪尖上》、《光的赞歌》，白桦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春潮在望》，公刘的《残雪》、《假如……》，邵燕祥的《我们还是拓荒者》、《一九七九年清明祭》等一批有棱有角、锋芒毕露的政治抒情诗相继问世时，人们情不自禁地报之以热烈的掌声。

然而，现在当我们站在诗歌艺术价值的立场上对“归来诗人群”复出之初（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作品作一番审视和反思，就不难发现艺术价值的相对匮乏，这与当时评论界的热情评价不大相符。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诗歌创作，是在已有的艺术成就之上原地踏步，甚至还有某种程度的倒退，很少有真正的诗歌艺术的突破。正如“九叶诗人”郑敏在1980年代末指出的：“所谓对诗人的‘平反’也就是改变了对政治运动的评价后引起的对诗人个人的评价。至于他的诗，我们却很少去研究。”^③ 当时评论界的误区和盲点也正在于此。“政治标准第一”的价值模式已经深深渗透到当时大部分评论者的理论构架之中。他们总喜欢在评论文章中出示“人民”、“时代”诸如此类相对空泛的概念来回避对诗歌艺术的深入细致的挖掘。也正因为如此，当时评论界向社会参与意识极强的艾青、公刘、邵

① 吕剑：《〈归来的歌〉书后》，见艾青《归来的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② 艾青《归来的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扉页。

③ 郑敏：《足迹和镜子——今天新诗创作和评论的需要》，《诗刊》1988年第8期。